

「國際經濟」論文選第一輯

在經濟思想戰綫上

東北計劃委員會統計局編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國際經濟」論文選第一輯

在經濟思想戰綫上

東北計劃委員會統計局編譯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出版

926·Q489·25K·P.120·¥4,80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五一年二月第一版

國光印書局承印

上海造00001—15000冊

·發行者·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各地分店·

三聯書店 中華書局 商務印書館

開明書店 聯營書店

目 次

論經濟方面科學研究工作的

缺點與任務 奧斯特洛維加諾夫 1

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院學術

委員會擴大會議的決議 24

反對關於帝國主義的著作中

的改良主義傾向 瓦爾加 32

*

反對統計學中資產階級的客

觀主義和形式主義 卡茲洛夫 49

*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的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問題 別裏夫 75

論經濟方面科學研究工作的 缺點與任務

——在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院
學術委員會擴大會議上的結束語——

奧斯特洛維加諾夫

毫無疑問，這次經濟研究院學術委員會的擴大會議，對於克服經濟領域中科學工作的缺點有着莫大的助益。在討論中涉及了一系列重要問題，並擬定了今後改進科學工作的具體辦法。

有幾位同志在討論中指出我們的科學工作已經獲得某些成績，特別指出說我們的大學已在進行科學研究工作，這話是很對的。

不待說，我們的工作是有成績的：我們在報紙雜誌上刊載了不少有關國內外經濟問題的文章，印行了書籍和小冊子，並大體上博得了報界的好評。經濟專科大學和大學經濟研究室的科學

工作，近年來確實是活躍得多了。許多經濟專門學校和大學的經濟研究室，已經聯繫了企業和集體農莊，他們推動社會主義建設，幫助完成了超計劃的節約。與此同時，他們也因而獲得了珍貴的資料去總結和應用平素的理論知識。但是這些成績推翻不了一個事實，就是我們的各個經濟研究院和大學研究室的科學工作，落後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情況，始終追不上黨和政府提出來的要求。因此，我們的報告就特地着重在科學工作的缺點上面。

下面談一談個別同志的發言。

巴里采夫同志提出了很多正確而很有興趣的意見，但是有幾點我們不能同意。巴里采夫同志說得很對，他認為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問題，必須成為科學工作的中心。但我們並不同意以描繪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輪廓作為研究的中心。

巴里采夫同志的這一建議的背後，隱伏着一個重要的問題：即研究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規律性的方法論問題。

巴里采夫同志在其發言中，曾不止一次地表示過，唯有從高級階段共產主義的規律性出發，才可以了解社會主義的規律性。這就是他所以要提議把研究共產主義的輪廓作為經濟學者的中心任務。這種方法論是不正確的，它引導作者走上空想社會主義的道路，不管他本人的意志如何。

科學的共產主義與空想的共產主義之間的原則性差別，就在於科學的共產主義從深切研究當前經濟實際情況中的趨勢出發，構想未來的社會。正因為如此，科學共產主義的奠基者——

馬克思和恩格斯，從未把具體描繪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當做自己的任務，而僅止於最概要的敘述，這是和空想社會主義者完全不同的。

沒有疑問，當社會主義建設日臻成功，並逐步走向共產主義之際，對於我們將要建立起來的未來社會加以盡可能具體地設想，是很要緊的。雖然如此，但若不引導科學幹部去研究走向共產主義的途徑和規律性，而指使他們猜測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那就大錯而特錯了。

我們曾經鑑賞過這種作品。一位候補者在這個指導原則下寫出一篇關於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的內容和方法問題的論文，就是以具體論述高級階段共產主義作為中心內容的。但是，由於現實情況還不容許我們周密地規定出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構成狀況，作者便求助於空想。他在科學論文裏，毫無科學根據地提出了集體農莊國有化的有害思想。不知道什麼緣故，據他的看法，斯維爾德洛夫省應當是國有化的發祥地，由此再推及全蘇各地。作者按年限和地區有層次地計劃了推行集體農莊國有化的步驟。未來的共產主義的農村被他推敲得真是無微不至。根據作者的看法，每個農戶應有一所房子和花園，並且園內必須有涼亭，每天的飲食將靠特別裝備的輸送管供應等等。這不是科學研究，這是馬尼洛夫式的空想社會主義者。

研究社會主義過渡到高級階段共產主義問題時，不可不把普及推廣社會主義建設的龐大實踐和深入研究共產主義的萌芽作為出發點。共產主義的萌芽是生長在國營企業、集體農莊、國

營農場和機器拖拉機站的實際工作中，表現在先進生產者，即工廠、集體農莊、國營農場的斯達哈諾夫工作者的創造裏，表現在爲爭取提高技術和勞動生產率，爲節約和超額蓄積，以及爲農村的全面電氣化而鬭爭的種種羣衆運動上面。

由此可見，蘇聯經濟學者的科學工作的中心任務，必須是在推廣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的基礎上研究建設共產主義的規律性。對這些問題的科學研究以及對向共產主義發展的科學的透視，將更清晰地刻劃出高級階段共產主義的輪廓。

談到卡茲同志的發言時，我應當承認我的報告對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總危機中諸問題的研究談得不夠具體。最近一期的‘經濟問題’雜誌裏，有一篇討論資本主義總危機的論文。從這篇論文裏可以看出多提新問題和多研究新問題是必要的。對這一點我未能談得更具體更詳細，是我報告的缺點。

卡茲同志一方面談新現象，和指責我們經濟工作者不敢提出新問題，另一方面却以半加僞飾的姿態呈獻出他的錯誤概念，實際上這個概念是“資本主義自動消滅論”的變形。卡茲同志，以沒有勇氣來說明我們經濟部門科學研究工作的一切缺點。我們也承認許多同志不敢提出新問題，是發展科學工作的最大障礙。然而不見得凡是勇氣都能解決問題：勇氣終究是勇氣而已。對此，魯賓斯坦說得很正確：“在你的新腔裏，我聽到了老調”。

可惜，首當此事之衝的，正好是卡茲同志的概念。卡茲同志在他先是寄給‘經濟問題’，以後又寄給了‘布爾什維克’雜誌的‘資本主義的崩潰’一文中，對自己的概念的實質所下的定義是這樣：

“這是向來的資本主義再生產規律性的徹底崩滅，是把這些規律性變成了與之恰恰相反的規律性，即在這個規律性的巨大而日益增長的潛在作用之下，資本主義社會的物資將必然減少規律性：(1)流動資本的絕對減少；(2)大量農產品停止變為商品（由於這種現象，注定了長期的農業危機）；(3)生產手段的生產必然落後於消費資料的生產，從而，生產‘不依附’於個人消費將不能存在；(4)固定資本總值將不可避免地、絕對地、迅速地減少；(5)蓄積，價值和社會生產品從自動增長過渡到它們的不可避免的自動減少；(6)資本主義再生產週期性的根本改變：世界性的高漲階段不復存在；(7)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法則的尖銳將達到強大資本主義諸國的好景氣不可能同時並存；(8)資本輸出的縮減；(9)世界市場的崩潰。——這就是獨佔資本主義的社會生產制度崩潰後所形成的新階段的經濟上的最重要特徵。從經濟觀點上看，這種支離破碎的現象更是現代經濟總危機的特色。”

這不是我們的刊物曾經批評過的“資本主義自動消滅論”的變形是什麼？卡茲同志研究現代資本主義所採取的方法是不正確的，非馬克思主義的，這一點就是他所寫‘資本主義的崩潰’一文的主要缺點。他在理論上分析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新現象時，忽視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個制度之間的鬭爭，忽視了蘇聯和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日見上升的影響。離開了這些便無從理解現代資本主義。卡茲同志的錯誤，實際上與瓦爾加同志在他最近著作裏所犯的錯誤是相同的——都是忽視了兩個制度的鬭爭。卡茲同志的結論雖與前者不同，但根本上仍不失其為錯誤

的結論。

卡茲同志宣稱他的‘資本主義的崩潰’一文的不被刊載，是因為我們無法駁倒他的論證。我們本來是準備把他這篇論文和我們對這篇論文的意見一併刊登出來的，無奈作者把它取了回去，另交與‘布爾什維克’雜誌了。

涅姆其諾夫同志在其發言中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並認為資本主義的殘餘思想意識是造成錯誤的根源。大家都知道，涅姆其諾夫同志與生物學沒有多大緣分，但是在討論生物學時，他顯出自己是一個最忠實的魏斯曼主義者。涅姆其諾夫同志肯正視自己的嚴重錯誤，這是值得歡迎的。

涅姆其諾夫同志似乎是一心一意要做一個自我批評的楷模，所以他一開始講話就聲明他犯的錯誤比我報告中所指出的還多得多。但是他沒有拿出足夠的勇氣來實現自己的美好意圖，終於把自我批評推到次要地位上去。他曾經說他是自相矛盾的，並說他寫的‘農作物和畜產的配置標準’的唯一缺點，就是這本書不能幫助解決實際問題。涅姆其諾夫同志承認了統計部門的領導從未批評過資產階級的統計學，而且與實際脫節。

涅姆其諾夫同志的錯誤，比他所想像的嚴重得多。‘農作物和畜產的配置標準’這本書裏有着嚴重的錯誤，這當然和他的生物學概念有着密切關聯。譬如涅姆其諾夫同志在這本書裏，作出了用卡路里、蛋白質、炭水化合物和脂肪計算農作物產量的計劃，如果我們在計劃裏把這個統計學的、生物學的方法，應用在如此重大、生息攸關的問題上，則必然遭到慘重的失敗。社會主

競計劃的重要任務，就在於更好地滿足蘇聯人民不斷上升的需要。爲了達成這一任務，我們不但要努力增加生產品的數量，還要使產品種類多樣化起來，而絕不需要那些抽象的卡路里、蛋白質、碳水化合物等。

由此可見，涅姆其諾夫同志的“自我批評”在許多情形下，是在替自己的嚴重錯誤作辯護。

馬斯洛夫同志的發言像一篇考試卷子，解答着統計學的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基礎。他像一個高材生，對政治經濟學與統計學的關係，至少在形式上有所領會並作出比較正確的解答，他說明了統計學應該是政治經濟學的工具，並且認爲統計學的地位應該僅次於政治經濟學。

雖然如此，馬斯洛夫同志的講話仍難使人感到滿意。它給一個印象，就是馬斯洛夫同志把考試解答用做避雷針了。把大會對他錯誤的注意力拉到一邊去了。

馬斯洛夫同志以面無窘色、洋洋自若的樣子指教了我一番，他說許多理論統計學家的思想裏還存在着資本主義的餘毒，說他們是屈伏在資產階級的權勢之下。但是他却忘記了他自己就是這羣人中的頭一個。

馬斯洛夫同志在自己報告的收尾，談到了自己的缺點，但這並不是爲了讓大家公開批評，而是爲了把缺點蒙蔽起來、化爲烏有。

馬斯洛夫同志談到自己缺點時說道：“報告者說，‘經濟核算的方法’這本書不能出版。很對，我也同意不出版。那本書基本上

是在 1945 年寫的，裏面難免有很多錯誤，特別是在日丹諾夫同志的報告發表以後，錯誤就更顯明了。我們的許多同志，曾經犯過這種錯誤。”

這不是自我批評，這是偽善。他在自我批評裏承認了些什麼錯誤呢？只承認了一點，就是他的書沒有出版。而對於這件事的原因却一句也不講。馬斯洛夫同志說，他也贊成不出版自己的書，這是假話。這件事，不合乎他的願望。馬斯洛夫同志辯解說，他的書是 1945 年寫的，該書所採用的方法，在那時還辨不清它是錯誤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況且犯這樣錯誤的不止他一人，許多統計學家都是如此。諸如此類的遁詞，不應該出自蘇聯學者之口。蘇聯的學者必須有勇氣老老實實地、直率而誠摯地承認自己的錯誤。馬斯洛夫同志還未能做到這一點。

瓦爾加同志的發言應當特別加以討論。

瓦爾加同志照舊頑固地不承認自己的嚴重的原則性的、被我們的黨報稱之為改良主義的錯誤。他不但不承認錯誤，反以堅持錯誤自翊。瓦爾加同志自命是個勇敢的人，他說他能夠不管有沒有法令，而敢於大膽提出新問題。嘴裏說的，就是心裏想的，在黨的面前毫不矯揉造作。這一席話歸根結蒂說明了瓦爾加同志不願意用布爾什維克應有的態度誠心誠意地承認錯誤。

這一點證明了瓦爾加同志還未能掌握科學之黨派性的基本知識，未認清自我批評“是推進發展的真實力量，是我黨手中強有力的工具”（日丹諾夫）。

瓦爾加同志，誰也沒有要你在形式上外表上承認自己錯誤。

大家期待於你的，是趕緊拋棄你在科學裏面的被貶黜的高高在上的地位，虔誠地檢查一下自己的錯誤，然後創作出適合於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要求的新著作，以表示糾正了自己的錯誤。從我黨的歷史中，你應當知道，堅持錯誤會造成怎樣的悲慘結局。你企圖把自己的錯誤歸咎於表現方法的不良。當討論國家問題時，你說過：“我不願意在詞句上爭執，——決定的意義、巨大的意義或增長着的意義，怎樣都行，用那一句都可以”。

聯共（布）中央附設的新聞班，牆上有這樣一個標語：“言論——就是行動”。根據你現在所說的代表了你想的言論，可以推斷它是引導你的行動走向改良主義的。

瓦爾加同志又承認了一個錯誤——他說該書的溫柔音韻是戰爭環境造成的。不錯，音韻是可以組成音樂的，特別是可以組成改良主義的音樂，然而，這裏的問題，遠不在於音韻上。

瓦爾加同志，你應該了解，這裏談的並不是音韻、詞句或個別表現恰當不恰當的問題，這裏談的是改良主義的錯誤。你以能“老實”、“勇敢”、“誠摯”地堅持錯誤而自誇，黨卻要求每個犯了錯誤的黨員老實、勇敢、誠摯地承認自己錯誤。日丹諾夫同志說過，畏懼自我批評的人是不配受到人民尊敬的懦夫。

對於你的“誠摯”，我是不勝懷疑的。你的發言，實際上只涉及次要問題，對於比較重要的、原則性的指摘，你卻頑抗地默不作聲。你不肯對這些指摘的本質加以答覆。這種行為豈能表現出你的“誠懇”？

你接受了很少一部份對你的書的批評，然而與其說這是布

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莫如說它是官僚主義的官樣文章。

你承認把新民主主義經濟，看成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是錯誤的，然而你緊接着又指出，在 1945 年，當你寫這本書的時候，這種看法是正確的，就這樣一筆勾銷了你的錯誤。

你想藉口你對農業的大規模生產優越於小生產問題的提法太抽象，以抹煞你對新民主主義國家土地改革問題的錯誤看法。然而你的錯誤是有着更深的根源——你對新民主主義國家經濟改革的性質的評價是錯誤的，忽視了列寧的理論，它指出障礙農業發展的大地主土地制的反動性。

你承認你所判斷的美國經濟危機的爆發期限是錯誤的，但隨後你又說這個錯誤是屬於非原則性的。

你承認了把你的著作分成兩本書，即一本是關於經濟，另一本是關於政治，是錯誤的。我看，問題的核心不在形式上，而要看對經濟和政治問題的論述如何。如果你把兩本不正確的書合為一本，豈能因此就產生正確的觀念？我認為這種算術式的機械的看法完全是錯誤的。

持這種態度是不對的，沒有一點黨派性，它只能使錯誤愈演愈大。

對於瓦爾加同志的概念的改良主義本質，必須略加敘述，因為瓦爾加同志對這一基本問題，始終是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瓦爾加同志說書的序言裏所講的，不可避免地引導讀者得出改良主義的結論。你說在戰後的資本主義條件下，存在着暫時的、過渡的因素，並且認為在今後十數年內，這些因素將佔優勢。“一個

貧困了的國家，經過十年八載，把生產力恢復到戰前水平以後，它才有可能表現出戰爭在資本主義裏所引起的根本變革。這個變革將表現在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上，即社會生產與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上，特別是將表現在實現問題，即市場問題的尖銳化上”。①

歸根結蒂，這就等於說戰爭暫時遏止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作用，並產生了暫時性的因素（貧窮化，貧窮國家的生產不足所引起的危機，美國生產過剩的危機等），這些因素將決定戰後十數年內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方向，所以資本主義矛盾的尖銳化，以及實現問題的尖銳化，須待十幾年之後才可能表現出來。

姑且不談提出這樣問題的人，是如何表現了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淺識和無知。而預言美國的危機以及提出關於資本主義的矛盾在戰時和戰後時期停止作用的論斷，則純屬無稽之談。

我們再把注意轉到另一方面——即瓦爾加同志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決定作用”、和戰爭時期資本主義生產的“計劃化”等問題上所表現的改良主義的概念，是以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暫時作用的論斷作為理論根據的。瓦爾加同志談到戰時資產階級國家的作用問題時，說資產階級國家為了進行有利於全體獨佔資本家和全部資產階級的戰爭，往往與個別獨佔資本家的利益背道而馳。

瓦爾加同志的立場假如真是如此，則我們之間沒有任何爭論餘地。在這一點上，瓦爾加同志同樣是違背了自己的“勇敢”和

① 瓦爾加：‘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引起的資本主義經濟的變化’。

“直率”，極力想偽裝自己的概念。

實際上，他是在強調國家對獨佔資本的依附性，在戰爭時期不但沒有增加，反而削弱了。在和平時期，國家是獨佔資本的工具，到了戰時，則國家爲了保護整個資產階級的利益，有時對獨佔資本加以限制。實際上，在戰爭時期，獨佔資本與國家機構的勾結程度以及獨佔資本對國家的影響，不但沒有減退，反而急遽增加，國家愈益成爲獨佔資本的工具。

對經濟實行戰時的調整，首先有利於獨佔資本家。國家雖然能限制個別獨佔資本家的行爲，但這與它當作工具的本質，並無絲毫任何矛盾。

以保護獨佔資本家利益爲己務的國家機構，往往在罷工和革命暴動的威脅下被迫向工人讓步，以便日後把統治工人階級的鎖鏈勒得更緊些。這一切，不但不違背，反而更證實了資本主義國家作爲獨佔資本的工具的本質。

瓦爾加同志援引了該書的第二章，企圖以措詞不當來抹煞他對資本主義經濟在戰爭時期可以實行計劃經濟的錯誤看法。瓦爾加同志在自己的報告裏剛剛這樣說完，轉身又主張資本主義經濟在戰爭時期必須實行計劃經濟。他說，戰爭需要大批飛機、坦克，而國家必須滿足軍隊的需要，因此國家必需進行“計劃”工作，即對企業分配原料和儲備物資等。瓦爾加同志所犯的嚴重錯誤，就在於他把資本主義國家的戰時經濟與計劃經濟混爲一談了。

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性與生產手段私人佔

有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盲目性的根基，如果不消滅這個根基，便沒有在資本主義下實行計劃經濟的可能。這個矛盾存在一天，便一天無任何計劃可言。瓦爾加同志在序言裏說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在戰時和戰後時期停止其作用，這樣講是不是爲了給你的關於“計劃”的論斷尋找理論根據？

馬列主義的古典學者，不否認成爲政治上層建築的國家對於經濟的反作用。然而反作用決不等於經濟的“計劃”。在原則上，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範疇。資本主義國家所起的經濟作用，以及它對經濟的影響，在最好的情形下，也不過是助長或阻礙經濟的盲目發展。國家在帝國主義階段干涉經濟，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戰時經濟調整，不但不能消除資本主義經濟的矛盾，反而促進了它的尖銳化。戰時調整的實施有利於獨佔資本家，並使各資產階級集團之間的矛盾愈來愈深刻。調整所追求的目的，是鎮壓工人階級，把戰爭的重擔加在工人身上，並加強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它促成了經濟的畸形發展，增加了個別部門和企業之間的不平衡性。它使財政寡頭的利潤猛烈上升，使勞動者的消費力急趨下降。

這一切加到一起，進一步激化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再生產的經濟危機。因此，資本主義的經濟，不論在戰時或平時，決無計劃之可言。抱着與此相反的觀點，就等於站在改良主義的立場上。

瓦爾加同志從這個非馬列主義的概念出發，刻劃出一幅改良主義的工人運動的遠景。他寫道：“將來國家的作用，會比戰前